



他者的眼光丛书

张旭春 主编

临近又遥远的世界

КИТАЙ У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

[俄] А. Д. 罗曼年科 主编 朱达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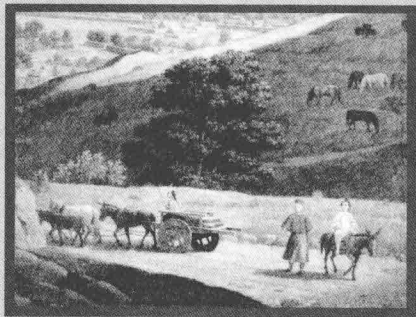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他者的眼光丛书

张旭春 主编



临近又遥远的世界

KHTAHY PYCCKHX TИHCATEJIEH

—— 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

[俄] A.Д. 罗曼年科 主编 朱达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俄)罗曼年科主编;朱达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他者的眼光丛书)

ISBN 978-7-301-18976-4

I. ①临… II. ①罗… ②朱… III. ①中国历史-普及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584 号

书 名: 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

著作责任者:〔俄〕A. 兀. 罗曼年科 主编 朱达秋 译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976-4/K·077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293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序 “他者的眼光”:在幻象与真实之间

张旭春

2008年8月,西班牙国家男子篮球队在飞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前夕,全体队员拍了一张广告照,照片中所有队员用食指指向他们的外眼角,做出一副斜眼、吊眼状。该事件立刻引起了海外华人团体的猛烈抨击。CNN援引“美国华人协会”(OCA)副会长乔治·C. 吴的话说:“在一个旨在促进世界团结和谐的盛会即将开幕之时,居然冒出这样的事情,这太令人遗憾了。”^①后来西班牙篮球队两位当家球星卡尔德隆和加索尔都为此进行了解释和道歉,一场风波也就不了了之。然而,对于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华人(以及所有黄种亚洲人)而言,欧美白人(当然年轻人和小孩居多)在黄种人面前用手指做斜眼、吊眼状的恶作剧并不少见,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种姿势对于大部分都有着细长眼睛的黄种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张恶作剧照片只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西方妖魔化中国形象的狂潮当中一个小小的事件而已:国人们想必对于2008年圣火传递期间西方媒体、政客以至普通民众的种种行为记忆犹新,当时无数本来对西方

^① Yuli Yang and Jaime Florcu, “Spanish Olympic basketball team in ‘racist’ photo row”, 载 <http://edition.cnn.com/2008/WORLD/asiapcf/0814/olympics.photo.spain.basketball/index.html>.

素有好感的普通中国民众一下子被西方人的偏见和傲慢深深地激怒了。愤怒之余,一个似乎既老套又简单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到底是怎样一种形象?

巧合的是,当时我正好在给四川外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讲授“比较文学名篇选读”课程中“比较文学形象学”部分(选编一套西方人如何看中国的译丛的念头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结合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我与学生们一起重点研读了让-马克·莫哈的《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主要在两方面:第一,他进一步清楚地阐明了巴柔教授所提出的关于异国形象的社会集体想象物(imaginaire social)问题。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或社会“集体描述的总和”^①。它涉及到诸多的层面,如大众舆论(奥运会前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集体妖魔化就属于这个层面)、“精神生活”(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或外交官等上层人物对异国的描述和研究,本套丛书所收录的许多西方作家和思想家对中国的论述属于这个层面)和“象征描述”(主要指的是文学和副文学,如游记等)^②。第二,莫哈的文章还提出了“所有的形象都是幻象(illusion)”这个重要的论断。^③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或社会对另一个民族或社会形象的塑造永远不可能是对对象国真实形象的复制或忠实再现,而是形象制造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对他者进行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在莫哈看来,这种对于他者形象的创造性想象一般体现为保罗·利科所谓的意识形态和曼海姆所谓的乌托邦两级形象。简言之,所谓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塑造就是对异国的妖魔化(从而维护和强化本民族或社会的价值),而所谓乌托邦式的异国形象就是对异国的浪漫化(从而批判和颠覆本民族或社会的价值)^④。

① 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30页。孟华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概念表示的是“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及一切人种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参见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8页。)西班牙篮球队的鬼脸恶作剧就是“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② 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30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④ 同上书,第32—34页。

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形象(或幻象)在西方人眼中的历史性变迁。佩里·安德森发表于《伦敦书评》(2010年1月28日)上的一篇文章将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历史变迁过程总结得非常清楚。他说与近东的伊斯兰世界不同,地处远东的中国由于距离欧洲太过遥远,从而不可能对欧洲构成任何军事或宗教的威胁,所以从马可波罗以来,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所激发的情绪不是恐惧或厌恶,而是奇幻:“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报道——现在看来大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在西方人心目中)塑造了(关于中国人的)美好形象,以至于哥伦布要远航去寻找远方的神州。”当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进一步了解之后,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总体上从奇幻趋向于敬畏:“从培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魁奈(Francois Quesnay),欧洲启蒙哲学家们都赞美中国是一个比欧洲文明化程度更高的帝国,她不仅繁荣富庶、人口众多,而且比欧洲人更加宽容并爱好和平,在那里,没有教会的宗教迫害,政府官员的选拔标准是依据个人美德而非世袭出身。即使那些对中央王国的过分溢美之词抱有怀疑之心的人——如孟德斯鸠或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富庶与井然有序虽然迷惑不解但也是印象深刻。”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他们看来中国不仅军事孱弱、经济落后,而且文化也是原始、残暴,充斥着迷信,“于是,敬畏被轻蔑取代,同时还融入了种族主义的警惕——亲华(Sinomania)翻转为恐华(Sinophobia)”。20世纪初,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镇压义和团之时,黄祸论在西方媒体和政客当中甚嚣尘上,以至于杰克·伦敦和J. H. 霍布桑(J. H. Hobson)这些作家在其作品中都努力勾勒出种种中国未来要征服世界的图景。但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钟摆又摆回去了:随着赛珍珠和宋美龄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的大力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人眼中趋于美好。1948年之后,急转再次发生: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给西方带来的恐惧、焦虑和噩梦甚至超过俄国。最后,安德森总结道:“今天,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又一次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媒体和商界对中国兴趣盎然,当下西方的这股中国热令人不禁想起洛可可时代盛行于欧洲的

那股中国风(*Chinoiserie*)。恐华症自然没有消失,但新一轮中国热又在形成之中。”^①

安德森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巴柔关于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钟摆理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的形象或被极度地浪漫化,或被极度地妖魔化。然而,在笔者看来,巴柔、莫哈等法国形象学研究者所谓“所有的异国形象都是幻象”的论断可能也有些绝对。不可否认,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存在着妖魔化/浪漫化的幻象成分。但是,有些在中国有比较长生活经历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察却并非完全是不真实的幻象——他们以“他者的眼光”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国民性的观察和描述在个别问题上甚至是相当犀利而精辟的(而我们自己却因为“身在此山中”而往往难以意识到),从而能够给我们提供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拷问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他对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s*, 1890)一书的阅读。在该书中,明恩溥总结了中国人的25种特质,其中一些负面品质对于国人而言可能是相当不中听的,如好面子、缺乏公共心、缺乏同情心、缺乏诚信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品质并不全都是明恩溥恶意的歪曲,以至于鲁迅先生也说此书“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②而且,黄兴涛先生指出,鲁迅先生“后来塑造著名的阿Q,对顾全‘面子’、喜欢‘做戏’和充当‘看客’(冷漠旁观)、“主奴根性”与‘自欺’、缺乏诚信和社会之爱、喜欢瞒和骗、保守巧滑等‘国民性’的体认、描写、和讽刺等”是明显受到该书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为学界所普遍接受”。^③比如就缺乏同情心而言,明恩溥说:“支那人见人之溺水者,是亦使外人见之而吃一惊者也。数年前,有外国之一汽船,于扬子江上失火者,时支那人之在岸集观者,宛如黑

① 以上内容均参见 Perry Anderson, “Sinomania”,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2 No. 2, 28 January 2010.

② 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③ 参见黄兴涛为《中国人的气质》中文版所写的序言:《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史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其实,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就已经指出了中国人身上的这些特点。马嘎尔尼可能是以自己亲眼所见来摧毁西方启蒙时期浪漫化中国形象的第一人。参见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London: Langmans, 1962), p. 222.

山,然概无救船中之乘客,及水夫者。”^①试比较鲁迅先生一段话:“在中国,尤其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来伸手扶住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②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明恩溥与鲁迅先生所说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我们还难以以个别事件来进行自我辩护(2009年发生在湖北荆门的捞尸事件想必大部分国人仍然记忆犹新!)。姑且再以一种现代“他者的眼光”为例来进一步反思这个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有一位名叫彼得·赫斯勒(Peter Hessler)的美国人人在四川涪陵师范专科学校(现为重庆长江师范学院)执教了两年,之后此人将他在涪陵两年期间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题为《水边的城市》(*River Town*)。该书对涪陵以及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描写在许多方面都充满了偏执、傲慢,甚至是恶意的诋毁,然而,他对某些问题——如中国式“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观察和分析却是相当犀利的。他指出,中国式的所谓集体主义精神其实只限于家庭、朋友或单位小圈子(因此中国老人能够比孤独的美国老人得到儿女更好的赡养),但却不会惠及陌生人。比如中国人几乎没有排队买票的习惯,而是像暴徒似的推搡拥挤,绝对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此外,他屡次在涪陵公共汽车上被好心人提醒注意小偷(一般是在小偷已经扬长而去之后),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在小偷作案之时站出来捍卫正义。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大街上发生车祸,立刻会引起路人发疯似的围观,这些围观者的第一反应不是对车祸受害人给予必要的救助,而是以毫无同情心的口吻打听“死了没有?”。赫斯勒不无尖刻地指出,中国人的这些品行与“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③

看来,“他者眼光中的异国形象”的确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其复杂性超出了以巴柔和莫哈为代表的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提出的、国内许多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者大都认可的“意识形态”/“乌托邦”之简单的二元模式:

①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158页。

② 鲁迅:《经验》,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③ Peter Hessler,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pp. 111—112.

一方面,它的确可能是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来的“非我的神话”,^①而另一方面则又可能是对某些因自我视野的局限而难以清楚认识的“庐山真面目”的再现——上述马嘎尔尼、明恩溥与赫斯勒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选编这套译丛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呈现“他者眼光的异国形象”这个复杂的问题。

然而,这套译丛的选编还有比学术探讨更为重要的现实考虑,那就是为当代中国如何塑造新的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提供一点借鉴。^②

当代中国一方面感受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自豪,但毋庸讳言的是,与

① 在《非我的神话》一文中,张隆溪教授由福柯在《词与物》中对中国动物的怪异分类出发,对西方人以“异托邦”思维制造“非我的神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作为非我的象征那陌生而异己的空间,以及摧毁秩序和逻辑范畴的威胁,这一切原来正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人的虚构。不过那虚构却产生于一种真实的需要,即福柯的所谓‘认识的考古学’建立一个框架,使他得以把自我区别于异己的非我,勾勒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自足系统的轮廓。”张隆溪:《非我的神话》,参见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② “他者的眼光”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自我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爱德华·萨义德深刻地指出,西方的东方学以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话语方式将地理意义上的东西方转化为文化意义上的“优等西方”与“劣等东方”之区分。这种划分不仅将西方的“地缘政治意识”(geopolitical awareness)转化为貌似中性的东方学知识,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西方人在东方人面前刻意塑造其优越的西方人形象,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大英帝国殖民政策中有这么一个规定:所有“在印度或其他地方的(英国)殖民官员一旦年满55岁就必须退休”,因为英国人“不允许任何东方人看到一个年老体衰的西方人”,他们必须给其印度等东方被殖民地人民留下“一个精力充沛、思维缜密、反应敏捷的年轻拉吉(Raj——即统治者)的形象”。然而,更可悲的是,“东方主义观念”不仅影响了西方人的自我形象塑造,也“影响到了那些被称为东方人的人”。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42. 对后一个问题,萨义德只是匆匆地一笔带过,然而却值得我们这些“东方人”深刻反思。孟华教授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一文中已经指出“华人自塑形象研究”——如海外华人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应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其实,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许多海外华人作家在塑造华人形象时往往是东方主义式的(如哈金作品中的自我东方化意识早已为许多国内学者所揭示),甚至一些出国学习或旅游的大陆中国人也往往不自觉地将自己东方化。笔者几年前在英国曾经看到一位从国内到英国探亲的中年主妇,虽然体态已经比较臃肿,但一旦出门上街,这位女士一定会换上正常的衣着,穿上鲜艳而紧身的旗袍,其“自我东方化”的潜在心态以及视觉效果可想而知。

此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国家形象的焦虑(也就是所谓软实力的困扰)。^①出于职业原因,笔者每天都有浏览西方主流媒体——如 CNN、*The Economist*、*Washington Post*、*Wall Street Journal*——的习惯。就笔者的观察而言,安德森所说的西方“新一轮中国热”至少在西方媒体中其实并没有多少 Sinomania(亲华),更多的是 Sinophobia(恐华)——前文所提到的 2008 奥运会前夕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就是明证之一:一个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西方截然

① 当然,国家有关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主动塑造中国的形象——如 2008 年奥运会美伦美奂的开幕式和 2011 年 1 月在美国播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等。但笔者怀疑这些举措对于扭转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如上文所言,张艺谋先生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就具有浓厚的自我东方化味道,这恰好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东方主义想象;而具有强烈精英化意味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则因过分注重名人效应而显得“宣传”味道太浓,反而不一定能够为西方受众所接受。这两种国家形象塑造都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的主体并非一群身着艳丽的超短旗袍、以陈美式风格用二胡演奏《茉莉花》的现代“东方化”美女,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少数几位西方人知道或不知道的文体明星,而是十三亿中国普罗大众!诚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国民性里的确仍然存在着诸如好面子、缺乏诚信和同情心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每当出现全民性危难之时,中国人会突然间闪烁出与他们素来的行为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性的光辉——汶川地震期间众多普通志愿者自费奔赴灾区无私地救助灾民的那些感人泪下的场景表明,我们的国民性中并不缺乏相互关爱、相互救助的同情心——这与明恩溥、鲁迅和赫斯勒的批评形成了鲜明而奇怪的对比。此外,中国普通百姓、尤其是无数微贱如像蚂蚁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蕴含的忍辱负重、质朴豁达、坚忍不拔的精神(明恩溥在他总结的 25 种中国人的特质中就有“坚忍不拔”,只是他的论述相当肤浅)同样是高贵人性的体现。笔者还清楚地记得 2008 年 5 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小萌在四川绵阳报道地震时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当时,大批北川县的灾民纷纷南下到绵阳避难,然而,却有一位瘦瘦小小的北川老农肩挑两个油漆桶(里面装着政府发放的饮用水和饼干等食品)逆流而上执著地要回北川去(虽然他的家已经“塌平了!”)。李小萌奇怪地问他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回去呢?这个当时已经 68 岁、名叫朱元荣的老人平静而质朴地回答,他一定要回去,其目的只有一个:“回去看一下,把麦子收了,把菜籽拿了”,然后再回绵阳,“这样以后也少给政府增加一点负担”。虽然李小萌和许多南下的北川老乡告诉他沿途余震不断,山上一直在掉石头,劝他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去,但他还是以简短而质朴的地方土话执拗地说:“我还是要回去”。然后挑着重重的担子继续北上。走了几步之后老农突然回过头,以同样简单和质朴的北川土话向李小萌和其他救助人员说:“谢谢你们操心了啊。”我想当时在电视机前收看这段现场报道的中国人(包括作为绵阳人的笔者本人)都被朱元荣老人所体现出的那种“微贱的高贵”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北川老农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精神信念,但他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那种中国农民身上固有的质朴而坚忍的品质完全不逊色于“五月花号”上那些清教徒!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坚忍和微贱的高贵等中国农民式的精神品质,使得“中华民族虽然迭经苦难”却永远“安如磐石”!(参见姚一苇:《元杂剧中悲剧观初探》,载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81 页)所以,笔者认为,塑造当代中国的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关键点在于:一方面要以宽阔的胸怀来继续拷问我们国民性中的弱点和缺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挖掘、提炼、总结并以恰当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普通中国人身上所蕴含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性的光辉。从而才能真正打破西方人“作为想象对立面那个非我的神话”。(张隆溪:《非我的神话》,第 217 页)。

不同的中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曾经积弱积贫、但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中国并不完全符合当代西方的期望——新一轮的 Sino-phobia 就不难理解了(虽然有些也不乏客观的观察和善意的批评)。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论述的那样,简单的妖魔化/浪漫化二分并不足以客观地概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者眼光”中的中国虽然有许多“幻象”成分,但并非所有的中国形象都是“幻象”。以客观、冷静、豁达和自我反思的胸怀来阅读“他者眼光中的中国形象”——不管是出自制造“异己”需求的浪漫化/妖魔化,还是建立在客观冷峻基础之上的尖锐的批评或由衷的赞美——对于改造我们国民性中的缺陷并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从而塑造良好的现代中国形象是有意义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①

如果这套译丛对于当代中国在进行自我形象塑造时能够产生一定的参考意义,使国人既避免“闭了眼睛”的“浮肿”,另一方面又不落入“自我东方化”的陷阱,那我们在策划、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艰辛也就不足为道了。

是为序。

2011年6月23日于歌乐山下
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① 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26页。

译者前言

《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是俄罗斯 2008 年出版的《中国马拉松》系列丛书之一。这本书收集了从 1678 年至 2005 年共三百多年里几十位俄罗斯作家关于中国的记述，他们中既有冈察洛夫、西蒙诺夫、爱伦堡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有斯帕法里、亚金夫神父、阿列克谢耶夫、斯米尔诺夫这样卓越的中国学者，更有卡尔曼这样用 10 公里长的电影胶片记录中国抗战史诗的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到过中国，有的还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目睹了有时候还参与了震撼和震荡中国的许多事件——19—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起义、血流成河的战争、内部冲突、外敌入侵和武装冲突等。他们对中国的记述往往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关于中国的描写尽管立场观点不同，有些甚至迥异，但他们的文字都曾在他们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俄罗斯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持久而悠远的回声，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认识中国的轨迹：17—18 世纪把中国看做人间天堂，对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倾慕不已；19 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他们看到的是僵化衰落的文明，中国的形象在他们眼中一落千丈；然而 20 世纪，中国爆发的民族民主革命让他们看到一头睡醒的雄狮，已经起来为自己的独立和发展而拼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美好的情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用眼睛看中国，用心灵体验中

国,用头脑思索中国,更以严谨的态度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内涵,这部分内容反映在本书的第五部分:“透过历史的深处”。

当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立场观点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的记述和评价并不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友好的,偏见甚至谬见时有所现。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记述和评价不管是褒是贬都是珍贵的历史见证。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俄罗斯人特别是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可能有着旁观者清的睿智,因此,他们的描写和认识至少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极佳的对比参照系。这也许就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翻译时对个别作品的标题作了变动,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最后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本书封面的图片元素取自19世纪俄罗斯一位随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中国的画家科尔萨林的作品《北京城外宫殿景色》,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肖玉秋教授提供,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达秋
2010年3月于重庆

编者前言

这本书收集了俄罗斯作家关于中国的记录。三百多年来(从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书出版的1678年算起)有不少俄罗斯的文学家、旅行者、政论作家、翻译家和新闻记者去过中国。他们中有些人自愿或被迫在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生活了多年,甚至几十年,还有一些人到中国作了较为短暂的旅行,只到过海上或陆地上有限的地方。在新时代他们常常是随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或为创作到中国。无论是何种情况,到中国都是一件大事,都是真正的发现。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中国都是一个新的、不平常的、留下深刻印象的和美丽如画的世界,大大不同于固有的概念和模式。

很多俄罗斯作家目睹了(有时候还参与了)震撼和震荡中国的许多事件——19—20世纪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起义、血流成河战争、内部冲突、外敌入侵和武装冲突等。他们的见证后来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俄罗斯报刊上登载了这些游记,后来又专门出版了旅行杂志、日记、含有大量历史知识资料的新闻日志、特写、政论文章、评论和述评的书;中国之行还产生了不少文学作品、畅销书籍:描写作者看见的或者想象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除了政治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异国情调外,深深吸引俄罗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还有中国的精神生活,信仰、哲学和诗学的起源和发展,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美学,以及除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好几百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与

中国人民的科学、智力发展相提并论)等之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性的创造。

很多俄罗斯的作家——拉吉舍夫、恰达耶夫、普希金、别林斯基、Вл 索洛维约夫、乌什斯基、列·托尔斯泰、巴尔蒙特、勃洛克、古米廖夫、沃洛申、阿赫玛托娃——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在他们的哲学、道德和诗学的探索和思考中,在他们通过创作对世界的系统认识中,中国一直都占有重要地位,获得某种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常的、几乎一直存在的形式。其实,他们就像其他众多的关注中国题材的俄罗斯艺术家一样……

而且,从沙皇和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的国务活动家、一等文官和大臣们(当然远不是全部,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行家”),例如,萨瓦·卢基奇-弗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А. Р. 沃龙佐夫、М. М. 斯佩兰斯基、Н. П. 伊格纳季耶夫、Е. В. 普提雅廷、Н. Н.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С. Ю. 维特等富有远见卓识,始终坚持不懈地关注中国的政治、贸易,关注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20世纪20—60年代,即布尔什维克的新时代,在俄罗斯,几乎所有在某个时期参与过制定“大政策”、成为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人都思考过、谈论过和写过中国,如:В. И. 列宁、Л. Д. 托洛茨基、И.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Г. Е. 季诺维耶夫、К. Б. 拉狄克、К. Е. 伏罗希洛夫、А. С. 布勃诺夫、М. И. 加里宁,还有他们那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和志同道合者。他们的理论论述和实践活动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候是极其不同的,悲剧性地不同。这些都在俄罗斯作家描写中国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这些作家是怀着十分好奇和非常美好的感情来描写中国的……

用俄语来描写中国的作品非常之多。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俄罗斯“中国学书目”(由苏联学者 П. Е. 斯卡奇科夫(1892—1964)花了几十年时间精心编纂),在今天每年都有新的补充,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中国学学者每年都用几十本科研著作和普及性读物、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来充实这个书目,它们都是研究过去和现代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在经历激烈的、充满矛盾的、有时候甚至是血流成河的冲突(这些在20世纪是非常明显的)后的21世纪,我们有可能翻开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国家的新篇章,揭开不久前那个时代很多的政治和外交秘密的帷幕,揭示它错综复杂的情况、内外矛盾和冲突。中国、美国、俄罗斯公开了新时

代的档案,这些档案是了解历史最珍贵的史料,是历史的镜子。这面镜子几乎毫不歪曲地、毫无修饰地反映出世界舞台上各种演员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行为。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历史剧的积极参加者的回忆录,在这些文献中,很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活动家、罪犯或者英雄的形象复活了。漫长的、激动人心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就像每天晚上在中国京剧的舞台上演出的众多的戏剧。对于我们这些近邻、很多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来说,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在过去时代的人们的回忆中、在现代人的观察和印象中被揭示出来。一次又一次,就像在几个世纪中不止一次地那样,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伟大的国家了解得不够,了解得很肤浅,了解得不全面,有时候甚至是错误地想象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生活和当前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正在明白她的内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千百年来支配着这个巨大的,从来没有过能够与它相提并论的独一无二的。这个充满矛盾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世界有一股持续的吸引力,让人沉醉于中国历史的浪潮中,淹没在对中国现在与过去那些日子的担心与焦虑中……

这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只是俄罗斯作家和新闻记者从1675年到2005年,也就是三百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作品的一部分。有关中国最早的“描述”是托姆斯克的哥萨克伊万·佩特林1618年写的关于在中国旅行的报告,在17世纪还有几份俄罗斯代表关于他们去大清帝国的使命的“专题案卷”。^①

这些使命的履行,就像尼古拉·斯帕法里在1675—1678年的出使一样,从当时流行一时的实用政策观点来看,大部分是不成功的。中国清朝的皇帝傲慢地对待俄罗斯沙皇派去的使臣,提出了一些领土要求,要求归还逃犯,要求纳贡,要求无条件地严格执行接见附庸国的礼仪的各种习俗和规矩。而俄罗斯代表将执行附属国的礼仪看做是对自己君主尊严的侮辱。但是俄罗斯的使臣们的报告仍然是有益的,尽管他们在这个国家逗留的时间不长,去的地方也很有限。不过,在斯帕法里之前这些报告都是那些有文化的、显然也是精明能干的人所撰写的(难怪这些文字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但并不完全是文学的。学识渊博的摩尔多瓦裔外交官斯帕法里具有非凡的文学才能和敏锐的

^① 参见 Н. Ф. 杰米多娃、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第一批出使中国的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1966年;Ф. И. 波克罗夫斯基:《西伯利亚哥萨克伊万·佩特拉1618年蒙古和中国之行》,圣彼得堡,1914年。——原注

目光,是俄罗斯第一个详细描述中国的作者。他的书至今还具有新颖之处,更不用说它对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了。

本书的作者生活在不同年代,抱着不同的目的,有着不同的任务,身处中国时对周围环境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他们中有些人有着坚实的专业修养,是俄罗斯中国学的创造者和奠基人,是学者,同时又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就其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来说又是艺术家,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就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精神的体现;有些是天生的旅行家,他们出于自己的志向周游列国,对于他们来说,旅行就是发现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充满了令人新奇的异国情调。还有一些是军人和革命家,首先是为了完成自己军人或革命者的职责,也许还有人不管不顾个人意志而臣服于中国的魅力。最后,在新时代还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把中国看做了第二故乡。

当然,每个人都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代表,都是自己那个具有特定生活观念和政治偏见的社会和国家的代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但是不论来客预先的内在的“既定性”或情绪是什么样的(这种既定性或情绪在任何旅行中总是不可避免的,不论对旅行有什么样的担心),不论在他的眼前展现的情况是多么的异常,多么的陌生,不论各种各样的局势是多么的复杂困难,有时候甚至是多么的危险,使这个客人陷入了或者可能陷入困境,但是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她的风光和她的建筑、她的风俗和习惯、她生活的风格和色彩不由自主主要征服和丰富客人的眼睛、心灵和理智。其实作家、艺术家、学者生活的使命最终在于发现和理解新世界及其生活于里面的人。对他们来说,去中国旅行成为一种了不起的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事情,对中国之行的回忆将永伴终生,促使他们对别人——时间和空间邻近的或相隔遥远的同胞和谈话对象——讲述这个不平凡的国家。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在近三百年间不总是晴空万里。这中间有过冲突,有过紧张,有过贸易纠葛,甚至还有过军事冲突。例如,在19世纪70—80年代,人们认真地讨论过与中国的战争。总参谋部的著名上校H. M. 普热瓦利